

# 教育的多样性认识

丹尼尔·帕特里克

西安大略大学, 加拿大·伦敦市 安大略 KLMNP

**【摘要】**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 哲学和教育之间最富有成果的联系之一是认识论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哲学家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和实践的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像理查德·保罗、爱德华·格拉泽和罗伯特·网球这样的学者就应该确定关键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并为他们的教学和评估开发方法。这种努力(可以说)在1990年达到了顶峰, 在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赞助下, 发表了一份关于批判性思维的专家共识(Expert Consensus on Critical Thinking, 即德尔菲报告(Delphi Report))。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有一位作者比其他任何一位都更努力地将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作为推理, 并将批判性思维置于教育哲学的中心关注之中: 他就是哈维·西格尔。在他的《理性教育》(1988)和《理性救赎?》(1997), Siegel提出了一个论点, 即批判性思维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由于它在使独立思考成为可能方面所起的作用, 它是一个普遍有效的理想。

**【关键词】**教育; 多样性; 认识

## Educational Diversity Awareness

Daniel Patrick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ondon, Canada Ontario KLMNP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fruitful links betwee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forty or fifty years has been the work of epistemologists, logicians,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er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tical thinking. Since the 1970s, academics like Richard Paul, Edward Glaser and Robert Tennis have been expected to identify key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develop methods for their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This effort (arguably) culminated in 1990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n Expert Consensus on Critical Thinking (the Delphi Repor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Delphi Report)). 1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 is one author who has worked harder than any other to put the teach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as reasoning and to place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central concer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arvey Siegel. In his Education for Reason (1988) and Redemption of Reason? (1997), Siegel makes the argument that critical think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education because of the role it plays in enabl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it is a universally valid ideal. “

[Key words] Education; Diversity; Awareness

西格尔的最新著作《教育的认识论》(Education's Epistemology)于2017年出版, 收录了他的17篇论文, 时间跨度从1999年到2017年, 并以作者的新引言作为序言。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不仅便于参考; 更重要的是, 论文的编排——回顾过去, 单独的论文与其他的论文并列出现(即使它们有时相隔十多年发表)——为西格尔从1988年至今的研究项目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线索。

继续《理性教育》和《理性救赎》, 这本新书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西格尔在那些书中首次提出的“批判性思维的理性概念”, 并针对最近的一些批评对这一概念辩护。根据“理性概念”, 批判性思维包括一个人在思考或行动时受到理性的适当推动。批判性思考者必须善于推理(从现有证据中得出理论或实践结论), 但更根本的是, 批判性思考者必须被激励去推理, 并根据他或她有最好的理由去做。在这个系列的文章, 西格尔的阐述了本质”概念的原因, 认为原因和理性规范的力量, 并声称这种规范性力量使得批判性思维的确切性质最重要的普通教育的目标(这是“他的前辈一样,”正如他所说)。最后, 西格尔认为,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他所捍卫的理性观超越了特定的文化, 只有在接受理性为认识论层面上的普遍理想的背景下, 才能理解多

样性的道德和社会政治价值。因为它问什么是“理性”, 为什么人们应该是理性的, 西格尔的书显然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项目; 此外, 因为他问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和发展理性, 这是教育哲学中的一个项目。这本书是认识论和教育哲学之间罕见的双向接触, 它促进了这两个领域的发展, 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教育认识论”确立为认识论的一个适当的分支。

教育的认识论之所以引人注目, 有三个原因。第一部分, 题为“理论的近期陈述和发展”, 把西格尔的批判性思维的理性概念带到了今天, 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自从他在30年前首次发表的《教育理性》中介绍了这一观点, 然后在《理性救赎》中进行了扩展。该书出版于20年前。第一章, “培养理性”, 阐述了西格尔理论的最新观点, 并为其抵御三个严峻挑战进行了辩护: 第一个挑战源于科学史; 第二, 从证言的认识论角度; 第三, 来自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西格尔反对上述三种批评, 为理性(以及通过教育促进理性)辩护——这个项目贯穿于本合集的所有文章之中。从根本上说, 他对这些批评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为了拒绝理性而诉诸理性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 试图表明一个人不需要理性是徒劳的(EE, 16-17)。最后, 任何反对理性的论点要么默认接受理性的规范性力量(因此主张的少于它的意图),

要么就不合理(因此失去了它的意图)。

其次,在对理性的辩护之后,该卷的第四部分,“理性与文化多样性”,包含了一个组织良好的,全面的展示西格尔对多元文化批判的回应。他的深入和耐心的参与,特别是在涉及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五章。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阅读,可以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特别是第15章——标题为“多元文化主义和理性”——几乎是罗尔斯主义的,它认为不同的文化应该受到尊重,就像它们尊重其他文化一样(EE, 243),它含蓄地呼吁各文化相互适应,以使和平的文化差异成为可能。这个呼叫联系在一起(a)西格尔关于尊重文化差异的道德和社会政治重要性的观点,以及(b)他认为理性是一种普遍的规范理想的观点,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这样,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就成为一种理性的理想。

第三,这本合集很有价值,因为它将一些最初出现在其他编辑过的合集中的章节一起出版,这些章节可能没有被西格尔的普通读者注意到。在阅读《教育认识论》时,我发现了新的材料——例如,第17章,“我们应该如何教育那些文化不赞成理性争论的学生”;第五章“‘你来掌舵,我开车开腻了;耶稣,给我指明道路’:教条,灌输,和压制批判的倾向。特别是后一章(从基督教乡村音乐中提取),提供了一个聪明的总结,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考虑一些人可能会理性地放弃理性,或理性地倡导他们自己的教化。不出所料,西格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在其他方面,西格尔的项目仍在进行中。例如,他在“批判性思维和智力美德”的第7章中,对优秀思维的智力美德的描述,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部分,它发展了一条看来要继续下去的论证路线。西格尔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积极参与批判性思维的动机,并为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倾向”(他后来称之为“批判性精神”)的重要性提供了宝贵的论据。在这本书中,他在许多背景下探索了批判精神。例如,在第三章“既非休谟也非(完全)康德”中,他认为批判性思考的动机既不是纯粹的情感(如休谟的思想),也不是纯粹的理性(如康德认为)。在第七章中,西格尔展示了,一方面,理智的美德和邪恶,另

一方面,理性和非理性思维之间的区别,并不能完美地映射在一起。在第4章“什么是(好的)思维倾向”中,他概述了批判性思维倾向是什么:他认为,批判性精神既不能简化为遵循形式规则,也不能简化为行为模式(EE, 55);相反,他认为批判性思维倾向是人们在需要理性思考的情况下必须理性思考的真正倾向,这种倾向可以通过教育进一步发展。就目前而言,这听起来不错,但在心理层面上,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倾向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培养的。正如西格尔所承认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逻辑的规则和程序来培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是这样培养的;它也不是通过单纯的条件作用培养出来的,因为这样的条件作用在理性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领域的挑战是如何成为休谟或康德以外的人。然而,在《教育学认识论》中,除了指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自己的立场既不是休谟的,也不是康德的,西格尔并没有说批判性思考动机的积极心理学解释是什么。正如西格尔在第7章中所写的那样,他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叙述并不感兴趣,这排除了一些哲学家试图弥合康德和休谟之间鸿沟的最明显方式之一;因此,他在整本书中的地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既非康德式的,也非休谟式的……也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这是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最有力的观点:在理解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批判性精神之间的关系时,准确地阐述了问题所在,并对历史和当代的主要选择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在这方面,教育的认识论与其说代表了批判精神的争论,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理性的本质以及理性如何通过教育对我们的思维形成规范控制的辩论的更新。

#### 参考文献:

[1]美国哲学协会, Peter A. Facione, 《批判性思维:教育评估和指导目的的专家共识声明》(San José: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90)首席研究员。

[2]哈维·西格尔,《教育理性:理性、批判性思维和教育》(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8年);Harvey Siegel, 理性救赎?关于教育理想的进一步对话(纽约:劳特利奇,1997)。